

阿格尔“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 不在于消费活动”理论评析^{〔*〕}

赵卯生

(中国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249)

〔摘要〕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异化了人的劳动本质,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从内在本质转变成了外在谋生手段,劳动解放是人的解放的必要前提。阿格尔继承马克思的劳动解放思想,提出“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理论,希冀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重构,引导西方新社会运动转向社会主义变革,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阿格尔“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理论弘扬了马克思的劳动解放思想,给沉迷于异化消费的国人敲响警钟。由于阿格尔提出的分散化、小规模的技术和“零增长”的经济模式背离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其所希冀的引导西方新社会运动转向社会主义变革终将陷入乌托邦。

〔关键词〕阿格尔;异化劳动;异化消费;人的满足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1.07.002

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如何创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更加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解读和考量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本·阿格尔(Ben Agger)在继承马克思的劳动解放思想基

础上,构建的“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理论的深刻含义,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价值。

一、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实现 劳动解放的必要前提

马克思的劳动解放思想是贯穿于其思想体系的最重要理论观点之一。马克思指出,在人与动物相区别问题上,虽然人类思想史上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诸多所谓“根本标准”,如宗教、文化、意识等,然而人们一旦着手进行生产劳动,开始

作者简介:赵卯生,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协同创新中心课题(中国政法大学)阶段性成果。

在劳动中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其实就已经开始把自身和动物从根本上区别了开来。那么,劳动是怎样将人类和动物区别开来的呢?马克思作出层层递进的系统阐释。首先,尽管人类是从动物界进化而来,尽管在人的身上动物特征依稀可见,然而,只要人作为“人类”而存在时,他就会自觉地把自身当作一种高于动物的类存在物、一种自由的存在物。其次,人之所以成为高于动物的类存在物,其根基就是人的劳动。这种劳动是一种生命活动,一种产生生命的活动,一种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进而证明自己是有意志的类存在物的活动。当这样的劳动成为人的本质时,人与动物就根本区别了开来。再次,作为人之本质的劳动,具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在特征——“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换句话说,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它必须是一种劳动者创造自我的自由自主的活动。人不仅能够在劳动过程中能动地再现自身,而且能够在劳动成果中现实地直观自身。

马克思强调,既然劳动是人的本质,那么,寻求吃、喝、性行为等物质消费和感官享乐则只能归属于人的动物需求方面,绝非人的本质需求。也就是说,人在进行物质消费和感官享乐时,只是在履行自身的动物功能,人只有在从事自由自主的劳动时,才是在表现自身的本质。毋庸置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雇佣劳动制度的罪恶之一就是异化了人类的劳动。具体而言: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剥夺了工人阶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劳动从工人的内在本质转变成了外在谋生手段,由此,工人的劳动不再属于他自身,而是属于资本家;工人在劳动中不是复现自身和直观自身,而是为资本家制造商品和创造剩余价值;工人在受资本家监督和驱使的劳动中丝毫感觉不到幸福,却总是能感觉到不幸福。工人不是积极主动地劳动,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着劳动;最终,人的本质与人的动物机能发生了颠倒性转变,“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

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1]既然劳动已经远离了人的本质,那么,商品消费和感官享乐也就堂而皇之地变成了人之为“人”的标志,所以,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的消费和娱乐中才能实现自我、才觉得舒畅,而在劳动过程中则正好相反,只有痛苦可言。马克思明确提出,唯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变革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进而扬弃异化劳动,将劳动从人的外在谋生手段重新恢复为人的内在本质,才能在最终意义上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人类每一个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然,劳动解放和人类每一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并不会随着私有制的消灭一蹴而就,它是一个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集体财富增加形影相随,直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直到“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2]才能彻底完成的长期过程。通过层层递进的论述,马克思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指明了劳动解放的光明大道。

甚为可惜的是,马克思的劳动解放思想长期以来被相当部分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忽视。相反,倒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思想。阿格尔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二、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 而不在于消费活动

作为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北美激进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成长起来的理论家,阿格尔立志于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以使其适应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社会运动^[3]的斗争形势,通过将西方新社会运动引向社会主义变革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

阿格尔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界定为一种方法,“一种把解放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可能性的设想与被压迫人民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的方

法”,^[4]这种方法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在阿格尔看来,从19世纪末期开始,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近百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诸流派都未能真正读懂“马克思的辩证法”的真谛,都未能真正把马克思辩证法的三个核心要素(1. 异化理论和人的解放观;2. 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规律理论;3. 资本主义危机模式理论)有机统一于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从表面看,西方马克思主义诸流派观点纷呈,甚至相互对立,但从最终结果看,西方马克思主义诸流派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它们都主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功能,丧失了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社会运动的积极能动的政治引领作用。^[5]

在如何克服西方马克思主义诸流派的不足,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功能问题上,阿格尔直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以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为主要表现的生态危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资本主义生产扩张受阻、商品供应受挫的现实状况,及时提出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由经济危机转变成了生态危机。由此,应当用适合当今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形态,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取代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形态。在阿格尔看来,这是“拯救马克思的观点和避免乌托邦主义的唯一办法”。^[6]

阿格尔强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可以帮助人们形成一系列新的需求,而这些新需求则进一步提供激进社会变革的新动力。阿格尔建构的“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理论,就是用来探讨当代社会人们需求结构的新变化,进而为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行之有效的社会激进变革寻求新动力、探索新模式。

阿格尔对当代西方社会流行的“异化消费”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之间的关系给予了明确阐释:“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了弥补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人们把贯注于消费当作满足需要的唯一源泉。”^[7]在阿格

尔看来,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带来人们的异化消费,而人们的异化消费反过来又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不断扩张的重要支撑,成为资本家获取更多利润的强大动力。不言而喻,自然生态循环系统的有限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无止境的扩张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无法调和的根本性矛盾。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爆发之时,就是“期望破灭了辩证法”的社会变革策略发挥作用之机:第一阶段,资源日渐枯竭和环境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迫使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张趋势不得不停滞下来,紧随其后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供应危机,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持续繁荣时期允诺给人们的可以源源不断提供更多商品以供大家尽情消费和纵情挥霍的期望被残酷现实无情地击碎。第二阶段,伴随人们无限获取商品以尽情异化消费期望的破灭,阿格尔建构的“期望破灭了辩证法”正好帮助人们经历一场幸福需求的革命性变革。即,手足无措的社会民众在深刻理解马克思的劳动解放思想基础上,自觉改变把幸福完全等同于闲暇时光的尽情消费和纵情享乐的异化观念,体悟到“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的真谛。第三阶段,伴随着幸福需求观的转变,人们将在创造性劳动中找到实现自我、满足幸福需求的同时,自觉克服消费异化,主动将资本主义当下普遍流行的“劳动·闲暇”二元对立状态转化为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的“劳动—闲暇”一元融合状态。在“劳动—闲暇”一元化状态中,人们进行生产性劳动时,不再把劳动仅仅看作是获得收入以实现消费的外在手段,而是在创造性劳动中满足自身的愿望和需求,实现每一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满足人的幸福需求的劳动应当是非异化的自主劳动

阿格尔强调,从表面上看,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已经由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对生态危机的消解措施自然而然地应当在消费领域内

展开,如,积极主动地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需求观、幸福观和消费观,化解人们消费异化的思想、改变人们消费异化的行为。然而,现实情况并非这么简单直观,仅在消费领域中采取行动还远远不够,只有深入到生产领域才能最终完成对生态危机的彻底消解。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及劳动解放思想来看,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社会大众的消费异化是工人阶级劳动异化所引发的必然结果,人们依附于闲暇时光的异化消费和纵情享乐,恰恰是为了弥补异化劳动带给自己的肉体痛苦和精神失落。就此而言,只要工人的劳动还是在异化状态下进行,只要工人的劳动还不是自由自主的活动,工人在劳动中还不能实现自我、满足需求,社会大众就必然会产生依赖于劳动之外闲暇时光的异化消费思想和行为,生态危机就必然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克服生态危机的一个必要前提,也是最重要前提就是消除无产阶级的劳动异化状态,在此基础上破除社会大众业已形成的“劳动·闲暇”二元对立观念。那么,怎样才能消除无产阶级的劳动异化呢?阿格尔借鉴后现代主义的相关论述,提出“分散化”“非官僚化”的生产过程理论和“自我施加的工人管理”理论。

(一)“分散化”“非官僚化”的生产过程理论

在阿格尔看来,如果说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是造成工人劳动异化的根本原因,那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工业流水线生产,以及相应的等级森严的官僚管理体制则是造成工人劳动异化,使工人在劳动中失去自主性和创造性,在生产中感觉单调乏味的直接原因。鉴于此,阿格尔倡导,当下迫切需要完成的,就是用分散化、小规模的工业技术取代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的工业技术,使人们能够在分散化、非官僚化的生产过程中满足找寻自我、实现自我的需求。

“分散化”的核心要义是在工业生产中运用小规模技术以取代资本主义当下的大规模生产技术,实行“零增长”的稳态经济以转变资本主义当下的高能耗经济模式。在阿格尔看来,这种

分散化的小规模技术不仅有助于缓解生态危机,更有助于消除由大工业流水线作业带给工人的身心破碎化感受。究其根源,阿格尔在这里提出的分散化、小规模技术,其实就是英籍法国经济学家舒马赫(E. F. Schumacher)在其代表作《小的是美好的》(1973年)一书中介绍的那种被称为既符合生态规律又尊重人性,同时还有利于调动人的聪明大脑和灵巧双手的中间技术、民主技术和“具有人性”的技术。

“非官僚化”的根本之处在于,以工人直接参与的民主化管理模式,改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过程中带有浓郁官僚习气的专家管理模式。在阿格尔看来,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过程中对处于低层级的劳动者实行强制调节的专家管理体制和强制命令的官僚管理模式,不仅使得工人的劳动过程高度破碎化,更使得工人在这种高度破碎化的劳动面前感到无能为力和单调乏味,毫无自主性、创造性和幸福感可言。阿格尔倡导的“非官僚化”管理模式就是通过以工人直接参与其中的民主管理模式,让工人成为劳动的真正主人,体会到自由自主的劳动过程带给自己的欢欣和快乐。在阿格尔看来,“非官僚化”劳动过程的最大益处是,鉴于工人的“必要”劳动与闲暇娱乐之间的界限不再明显,社会大众更倾向于把人生的意义和幸福的体验置于劳动的创造过程中,而非劳动之外闲暇时光的消费挥霍中,“劳动—闲暇”一元化最终得以实现。

(二)“自我施加的工人管理”理论

阿格尔强调,仅有“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生产过程还不能彻底消解工人劳动的异化状态,这中间还需要加入一个特定环节——“自我施加的工人管理”。如果没有这一条,上述“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生产过程必将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强力干扰,使其效果大打折扣。所谓“自我施加的工人管理”就是把工厂企业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生产过程的管理权直接交还给工人阶级,通过提高生产过程的民主化管理标准,实现工人直接拥有和管理生产资料、直接

参与和管理生产过程,最终成为劳动的真正主人。究其根源,阿格尔的“自我施加的工人管理”显然受到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影响。他认为,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工人不仅拥有生产资料,而且通过工人委员会直接管理生产资料,这才真正符合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自由的观点: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工人必须直接参与管理自己的劳动过程和生产资料。

阿格尔强调,“自我施加的工人管理”无论就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而言,彻底消除其异化状态都是不可或缺的。具体来说,首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产阶级既不可能拥有生产资料,也不可能支配生产资料,由此,无产阶级的劳动异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大众的消费异化不可避免。其次,在带有极权专制性质的社会主义国家,那里的工人阶级仅仅是法律层面上的生产资料所有者,他们并不能实际地支配工厂的生产资料,当然也就不可能实际地直接参与和管理生产劳动过程。工人阶级依然是被异化劳动所控制的受害者,他们的幸福和快乐还是不能来自劳动过程的自主创造,只能来自闲暇时光的异化消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格尔强调,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于传统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在那里,劳动者不仅拥有生产资料,同时还管理生产资料。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才能成为劳动的真正主人,“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也才能真正实现。

四、人民群众在生产中而非消费中创造美好生活

阿格尔“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理论,以及建立其上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们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更丰富内涵创造美好生活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

(一)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阿格尔正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传统产

业工人的斗争日渐衰落,而新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现实状况,立足西方资本主义世界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的严重生态危机,及时建构起马克思主义新形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希冀通过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能动性,在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和引导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的同时,亦将西方新社会运动引向社会主义变革道路,实现人的解放和人与自然的和谐。阿格尔在这里具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的高度自觉性,这是其应被充分肯定的难能可贵之处。正是在阿格尔、奥康纳、福斯特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日益发展成为当代世界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的理论思潮,“以致有人甚至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和一种新的形态”。^[8]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阿格尔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表现出明显的错误之处。阿格尔避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将“人的解放”策略和社会主义变革道路归结为消除人们的劳动异化和消费异化等极具主观色彩的“个体需求”的变革方面,这使其难免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窠臼。阿格尔曾乐观地认为,只要其“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理论切实发挥作用,必将能够汇集起变革资本主义、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的强大革命洪流。事实证明,阿格尔明显高估了西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严重性,他所构想的“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理论也没能真正奏效。当然,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找寻到真正的革命动力、如何探寻出切实可行的革命策略,是包括阿格尔在内的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共同面临的困境和难题。

(二)在弘扬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的同时,给沉迷于异化消费的国人敲响警钟

阿格尔“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理论,既是对马克思的劳动解放思想的弘扬,又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着力于批判资本主义、实现人的解放的历史使命的承接。在阿

格尔看来,伴随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生态危机的日益加深和最终爆发,人们在渡过刚开始的手足无措、悲观绝望之后,经过正确的理论引导,可以回到马克思的劳动解放思想中去,认识到“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的真谛,自觉改变那种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异化消费的观念,在劳动中而不是在消费中实现对自由和幸福需求的满足。不言而喻,人们的消费观和幸福观的转变,以及最终对消费异化的破除,对于当代西方社会的革命运动意义重大,因为,消费异化的思潮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消解着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能动性,起到支撑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作用。

阿格尔“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理论,无疑主要是根据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状况提出的。然而,这一理论的重大意义早已超出了资本主义范围,它对身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奋力拼搏以实现更幸福的美好生活的中国人民同样具有启发意义。阿格尔注重探求当代人的需求结构问题,其“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理论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人们创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新的存在方式,即从“在消费活动中实现人的满足”的旧生活方式转变为“在生产活动中实现人的满足”的新生活方式。伴随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西方消费异化思潮对我国部分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影响甚大。当下,相当数量的国人在一定程度上沉迷于异化消费,信奉“更多占有、更多消费”原则,自觉不自觉地将占有商品的多少和消费商品价值的大小确定为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尺。出于攀比和炫富心理的炫耀消费、奢华消费、时尚消费之风盛行。面对普遍存在却被国人忽视的浪费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发出“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的感慨,我国更是于2021年4月29日通过了《反食品浪费法》,将防止食品浪费上升到法律制度层面。显而易见,

消费异化和“占有”的生活方式,不仅与马克思的劳动解放观背道而驰,而且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和人民创造美好生活也是危害甚大。党的十八大以来、十九大报告都明确将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与改变当下国人的生活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充分说明我们确实应改变当下的消费异化理念和“占有”的生活方式,在全社会倡导“生命的价值在于创造,而不在于消费”的新生活理念和新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党和政府在积极推进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中,应尽最大可能提供能让全体劳动者都有彼此适宜的工作岗位,同时尽最大可能优化劳动过程的诸环节,让广大人民群众在自由自主的工作过程中实现自我、放飞理想,创造出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

(三)分散化、小规模的技术和“零增长”的经济模式背离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终将陷入乌托邦

阿格尔高度关注后现代主义的反总体性原则,并将其贯穿到对消解全人类普遍共存的劳动异化和消费异化,克服全人类共同面对的生态危机的设计之中,信奉“小即美好”的舒马赫主义,倡导分散化、小规模技术和“零增长”的稳态经济模式是确保实现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可靠路径。阿格尔的这一理论创新确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不容忽视的是,阿格尔倡导的这一所谓“可靠”路径,既背离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又违背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最终陷入乌托邦也就在所难免。

唯物史观立足于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基本原理,强调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具体而言,第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进而决定其他社会关系的基本面貌,决定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第二,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内容,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基于此,无产阶级的解放、共产主义的实现,以及人类每一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都离不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

需的实际前提……,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9]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地球村”背景下,无论是世界各国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国民经济的诸环节,还是人类面临的人口、生态、安全、灾害等自然和社会问题及其解决方案都早已超出了一国范围,需要全球协作和共同发展,根本无法将其分割为一个个彼此分散、各自独立的部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10]另外,就节约能源和减少污染而言,分散化的小规模技术并不比集约化的大规模技术更具优势,反而次之。在这样的情形下,阿格尔提倡小规模经济和分散化技术体系,明显违背客观规律。再者,所谓“零增长”的稳态经济模式仅仅是阿格尔等人的一厢情愿而已,在现有的世界经济格局下,显然不具有任何可操作性。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民经济保持一定增长速度的持续性发展是它们摆脱饥饿、消除穷困、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向往和幸福追求的必要前提和主要途径。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明确批判过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

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是反对的,同时又是空想的。……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11]

注释: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0、538-539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5页。

[3]“新社会运动包括绿色运动、女权运动、民权运动与和平运动。他们构成一个由那些知道他们自己有共同利益的个体组成的集体行动者。与政党或压力集团不同,他们拥有大众动员或大众动员威胁作为他们主要的社会惩罚手段。”[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4页。

[4][6][7][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490、494-495页。

[5]参见赵卯生:《生态危机下人的解放——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评析》,《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8]陈学明:《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页。

[1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页。

[责任编辑:汪家耀]